

文史資料

第一輯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

选编

• 1986 •

目 录

编者的话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青年运动的片断回忆
.....杨秉成 (2)

惨绝人寰的魔窟

——日本侵略军731部队细菌制造厂遗址纪实

.....黄宇宙 夏家骏 (41)

中东路事件初探

.....李铁醒 马拉钦 周为民 (57)

缅怀妈妈王以秀烈士

.....桂家鸿 (78)

为国捐躯 死而不已

——清末抗击沙俄侵略的爱国志士寿山将军简记

.....黄宇宙 夏家骏 (93)

编 者 的 话

编印《文史资料》，是我们参事、馆员多年来的宿愿。近几年来，大家积极响应周恩来同志关于抢救文史资料的号召，不遗余力地回忆、整理、撰写成文，记载了大量的活史料，实为宝贵而难得。我们将陆续选编，作为内部资料，供有关方面的同志研究参考。

《文史资料》发表的文章，是作者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回忆录或某个历史侧面的研究，有一定史料价值。内容以与黑龙江省有关的史料为主，亦选登带有普遍意义的全国性的革命活动回忆或其他史料文章。由于作者年事已高，在史实、观点诸方面，不尽翔实，加上编辑工作水平有限，缺乏经验，差误难免，请关心本刊的同志不吝赐教，以利改正。

一九八六年六月六日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青年 运动的片断回忆

杨秉成

一、成都、武汉青年运动的一些情况

过去的很多往事、随着岁月的消逝，大部分印象都渐渐地淡薄了，在我亲身经历的战斗历程中，虽然某些事件有时还深深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但已不够完整了，只能就记忆所及，片断回忆，以供参考。

芦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天，我正到广西的梧州，一上岸大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声鼎沸，一打听原来是庆祝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部下奋起抗战，击退日寇进攻，夺回了芦沟桥。芦沟桥的枪声，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日战争全面开始的前奏。

我是怎样到了梧州市的呢？在一九三七年初，我作为北平学联代表到上海，与上海青年会刘良模接上关系后，由刘良模把我介绍给吴祖贻同志。我与吴一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木器

行的楼上连人都站不起来的一个小亭子里，不久又由小吴领着我会晤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何伟同志、段君毅同志和全联的邹问轩同志，还有一位在全救与全联负责编辑会刊的吴大琨同志。

按照何伟、段君毅二同志给我的任务，是代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全国民族解放先锋队与民先队员肖玲(女)伴行，一起去四川成都，视察救亡工作，重点是作四川军阀省政府主席刘湘的上层统战工作。在上海逗留期间，经地下党组织介绍了上海市各界秘密组织(如读书会等)活动，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报告会，同时又与施复亮及刚由英国转道苏联归国的于炳然及其爱人钟殊漪(女)与孙西林等作了会晤。介绍北方平津一带救亡运动概况。

先是在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间，由上海出发，途经武汉大学，在李锐同志帮助下，在武汉三镇作了一段宣传工作。又经邓初民介绍至长沙做一段工作后又返武汉转赴重庆。在重庆秘密救亡组织协助下，曾作短时间逗留，与新蜀报总编辑会晤，为重庆大学与重庆女子师范

学校作过报告，交流了救亡工作经验，最后抵达成都。

抵成都后，与四川大学理学院的韩天石同志接上了关系，他当时把我隐藏到华西大学附中的王揖处居住，最后因风声很紧，隐藏不住，我又搬到川大理学院与韩天石同志住在一起，并共同研究过怎样利用四川各种势力的复杂矛盾，开展救亡工作。

当时四川是全国复杂矛盾集中的 一个典型，各党各派都在四川搞秘密组织活动。主要矛盾表现在四川军阀刘湘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比如一九三六年两广爆发“六·一”事变，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以出兵北上抗日为名，准备与蒋介石决斗。两广事变前后，李、白为了反蒋与各地实力派军阀如刘湘、韩复矩、龙云、宋哲元等都有秘密联系。当时我在成都，李、白的秘密代表住在一个深宅大院的团长公馆里，而且彼此间有秘密联盟协定。当时由于川军的政治部掌握在复兴社手中，从而使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更为激化。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决定派张群到四川主揽军政大权，要迫使刘湘下野，但

刘湘是四川的土皇帝，在四川有实力，说了算，蒋介石唯恐刘湘在四川再一次发动像“双十二”事件一样的事变，所以迟迟未敢动手，一直拖到“七七”事变也就不了了之。刘湘正因为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所以他也愿意与左派救亡团体接触。

我们设法通过张澜（号表方，当时是刘湘背后的参谋长），与成都市市长陈炳光的努力，与四川省主席刘湘作了会晤，在抗日救亡问题上，诚恳坦率热情地交换了意见。他当时表示对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提出抗日的八项要求，表示拥护，但不同意释放蒋介石。他象各省的军阀一样，都想趁此机会，以便把四川军队开出去，多占领一些地盘。同刘湘会晤后，在成都取得了救亡活动公开合法的地位。我们在地下党的秘密领导下，经常与车耀先、康乃尔、张宣、韩天石等到成都祠堂街“努力餐馆”（也是《大生》^①周刊的社址）召开秘密会议，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共同谋划组织

^①注：一九三七年一月，四川中共地下党员车耀先同志创办《大生》周刊兼任社长后被蒋特逮捕杀害在渣滓洞松林坡焚尸灭迹。

成都市破天荒的各界游行大示威与“五卅”运动纪念大会。张澜曾在大会上作了演说。我当时写了一篇通讯报导，以杨永生化名，登在上海邹韬奋编的《全民抗战》刊物与英文报刊“The Voice of china”两种刊物上。对四川群众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当时车耀先同志主编的刊物经费发生了困难，我通过四川的上层进步人士为他创办的影响很大、信誉很高的《大生》周刊募了款。由于我的秘密活动被查觉，国民党特务机关下令通缉，到处捉拿，最后由于炳然的爱人钟殊漪（她当时正好由上海回到自己的四川家乡，上层社会关系比较多）介绍隐蔽到一位四川的开明军阀张志和师长的公馆里，

在党的领导下，在成都曾举行一次群众秘密集会，地点在狮子山，离成都市约五十余华里。当时到会的大中学校青年学生约百人以上，大部分都是民先队员，他们有的骑车，有的步行，大家都集中在狮子山下的茂密树林里，韩天石同志主持会议，由我报告平津学生及全国各地的救亡运动概况。

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我离开四川，到了

贵州省贵阳市，接头关系是在一个贵州大军阀的公馆里，引起这个军阀的怀疑，进行了种种的盘问，由于暗号名称不十分准确，险些暴露，最后是她的女儿出来解围，假称彼此是由南京坐船在途中结识的，才化险为夷。他的女儿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握别时，我说不出来怎样的感谢她才好。她当时约二十岁，现在年龄当在六十八岁了，不知是否健在？可惜她的姓名我都记不起来了。

我在贵阳，千方百计设法，好不容易在贵阳师范学校找到了接头关系。在地方秘密组织领导下，曾在贵阳郊外召开过数次秘密集会，作了报告。有一次在苗族一个家庭中开秘密会议，不知为什么外面放哨的一声暗号，大家一齐从窗户跳出各奔东西。在贵阳的工作中，感觉白色恐怖比四川还厉害，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离开了贵阳又到了广西桂林，与邓初民、尚仲衣、于卓等人士会晤，同时在尚仲衣教授的帮助下，下榻于一所中学，接触到十几位进步的男女教师。当中有陈光宇（女）等。

在桂林逗留时，议事日程排得很满，每日

都有集会，不是座谈会，就是报告会。一日邓初民，约我到他家吃便饭顺便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李宗仁、白崇禧为日寇加紧向中国进攻，向蒋介石提出八项要求。我当时把内容抄下来后，迅速用航快挂号，发给北平新报的主编金肇野同志。后来听说北平新报刊登了李宗仁、白崇禧的八项要求，北平各界人士受到很大震动。

离开桂林沿桂江而下，两岸群山千姿百态，形状各异，分外妖娆。途经梧州（芦沟桥事变的当天）到广州、香港，住在九龙何思敬教授家（何当时在延安）。何的爱人给予殷勤的接待，她又介绍广州民主党派人士李章达与我会晤，并与南方在上海十九路军抗战时所说的四大金刚之一的陈铭枢会晤，交换过抗日救亡的意见，在“八一三”抗战前夕，我由香港乘英国皇后轮与蔡廷锴同船返回上海。

我返回上海正当北平已经沦陷，“八一三”抗战前夕，上海各界爱国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立刻动员起来，支持二十九军抗战。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奋起抵抗，以身殉国，最后退到了保定。

到上海，我立即会见了何伟，向他汇报了工作。当时我住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内，也会晤了阎宝航。当时组织上又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到保定前线慰劳二十九军伤病员，并介绍到法租界拉斐德路、拉斐坊，拜访了何香凝，她嘱托要把上海捐助的大批慰问品送给在保定前方浴血抗战的二十九军将士。我到上海铁路局作好了装运工作，到达地是保定，正要启程时，上海四马路附近，日本军队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人心惶惶，不少争先恐后逃奔租界。

由上海乘车抵南京，逗留了几天，与南京学联领导人胡筠洪、祁式潜、李庚、蒲安修等会晤。李庚还介绍我与许宝驹、郭春涛会晤，筹组平津流亡同学会。当时南京正在召开军事会议，沈钧儒等七君子爱国领袖此时已经无罪释放，也同时列席了军事会议。当我与李庚一起去相会沈老时，沈老当面告诉我，南京政府已经决定抗战，四川的刘湘也出川被李、白担保参加了军事会议，四川的军队也要出川，开赴前线。沈老决定在第二日与陈诚一起坐军用汽车到上海组织民众支援工作，上海总攻即将开

始，我们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振奋人心！

由南京出发到了前方石家庄，听说保定吃紧，二十九军准备从保定撤退，慰劳品不能送到前方，当时平津流亡同学正在石家庄慰劳伤病员。我于是就把大批慰劳品就地发给当地医院，当时在石家庄恰遇二十九军参谋长刘治州（号刘定武，我是一九三六年在北平时由许德珩介绍结识的，一九三六年，北平几次大的游行示威运动，他在宋哲元面前作了大量工作，以致未形成大的流血牺牲，他起过很大的作用）。当时听流亡的同学说，在保定的张荫梧把韩天石同志当汉奸逮捕了，刘治州当时给前方拍了电报，设法予以营救。后来听韩天石同志说主要是由八路军太原办事处营救出来的。

离开石家庄，我又到了太原，遇见了李昌、于光远、杨雨民、赵德尊、杜润生等平津流亡同学。听说赵德尊由北平逃出时，随身秘密带出民先总队部全体民先队员名单，险些被日寇搜出。在太原时，我曾经到八路军太原办事处，听彭雪枫处长报告了当前的形势。有一次还与平津流亡同学一起打着小旗到车站欢送八路军到前方抗战，当时薄一波主持山西的牺牲

救国同盟会，参加的成员都是山西进步的青年，唯有梁化之，比较顽固。有的人正组织公道团，与进步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对立。当时曾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清华大学同学叶笃义、叶笃廉、纪毓秀（女）等很早就由北平被派到太原作为骨干加强牺盟的工作。在太原市遇到日寇第一次轰炸。

我离开太原经徐州，又到了济南，帮助组织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工作，途经徐州车站又遭到敌人六架飞机轰炸，当时徐州车站正停留有二十列兵车，是汤恩伯的部队由绥远调出支援上海抗战的，我们的高射炮也不示弱，打下来敌人飞机三架。站台上的旅客寥寥无几，我与一位济南齐鲁大学的同学，两个人一齐跳入没腰深的水楼子里，我张开咀堵上耳朵，一颗炸弹正落在水楼旁边，险被炸死。在济南为了安置好平津流亡同学曾与黄松龄教授等通过上层社会关系作韩复矩的工作，到了济南又遇到敌人飞机轰炸，由于武汉来函来催促，我又立即转回武汉。

我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抵达武汉的。这个日子记得很牢，报童在大街小巷喊着

“号外！号外！有重要消息”。原来是国共两党发表了第二次合作宣言，在武汉我与何伟、蒋南翔、李华、姜纪常（姜世勋）等平津救亡同学会了面。他们告诉我，现在有一个新任务，准备派我与黄诚、谢云辉到四川开展工作（据许德珩亲口对我说，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时，由于刘湘的建议，还希望我回四川组织全四川救国会作动员宣传民众抗日救亡工作）。不久我在武汉又接到四川车耀先的亲笔函，他极力敦促我重新回到四川工作。当我们三人奉命正在整装待发时，上级又决定我留在武汉开展救亡工作。首先是武汉市平津流亡同学会组织。因为大批平津同学都集中到了武汉，衣、食、住急待解决，我们当时与鲁明健走访湖北省省长何成浚，希望政府大力协助。最后确定在武昌湖北省党部为住宿地点，由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也同住在一起，东北救亡总会也相继成立，由阎宝航、刘澜波、于毅夫、于炳然负责领导。在武昌省党部一次欢迎同学会上，由金山与张瑞芳合演的《放下你的鞭子》，至今记忆犹新。

到了武汉以后，感觉到武汉正经受着抗战

风暴的袭击，武汉的防空设备非常简陋，与南京比有天壤之别。敌机第一次轰炸南京时，我正好在南京。空袭警报发出后，市民很快进入防空洞，街上很少行人，老百姓像久经演习锻炼似的，习惯用尿（阿母尼亚尿素）往咀上抹一抹以防飞机散毒气，飞机低飞接近电线杆子，可以看到机舱里的飞行员。由于敌机低飞扫射，大家不得不爬到床底下用棉被盖在身上，避免中弹。这时我方高射炮齐发，士兵站在山上也用步枪打，结果敌机被打下了四架，惶惶逃跑了两架。而武汉则不然，飞机轰炸时，老百姓在武昌的像赛跑似的爬上蛇山，在汉口的市民群众都要向江边跑，来不及跑的就得在家中等着挨炸、碰大运。

当时武汉民众还没有动起来，只是士兵在前方打仗，后方抗战气氛阴郁，因此各地来到武汉的青年感觉抗战前途渺茫，他们在徘徊、怅惘。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战、为救亡，都各自寻找出路，有的到延安，有的到前方。

党为了发动武汉民众，团结青年，坚持抗战，在长江局青委与湖北中共青委领导下，由蒋南翔、杨学诚负责筹组武汉青年救国团，派

我任该团交际部长，郑代巩、张亮（张维明）、何维登（何礼）相继为付部长，进行与国民党各阶层联系备案等筹备工作。团部设在蛇山外国语补习学校楼上，团长是袁汝镛、付团长为范元甄（女），我当时任蛇山外语补习学校校长。

最初我到武汉为了掩护工作与安定生活、曾与齐国卿（铁华）、刘源熙，筹建一所外语补习学校。内容有俄语、德语、英语、世界语等，主要以俄语为主。过去南京政府订购的都是德国、意大利的飞机。由于德、意与日本是轴心同盟，所以南京政府订购德、意的三百架飞机都飞不起来。抗战初期中苏签订友好条约，由苏联驻中国大使包格莫洛夫与中国约定支援二百架飞机，损失一架就补充一架，因此抗战初期苏联飞行员接踵而来。由于过去南京政府怕“赤化”不让人们学俄语，因此驾驶员来到中国缺乏俄文翻译，临时物色了一些哈尔滨工大毕业的，但为数不足，我们过去是在东北大学俄文系学俄文的，为此创办了这所学校。报名的学员大部分都是政府的官员，校址设在武昌胡林翼路三道街39号（原来是国民党周佛海住

过的二层小楼。)每月学费收入可以勉强维持生活，教课的有张仲实(留学苏联翻译过政治经济学)、张郁廉(女)，她当时在武汉塔斯社工作教俄语会话，刘王立明(女，清华大学的)教英语，陈北鸥(又名亚克)教世界语，又增设了法语、德语。还有齐国卿、刘源熙教俄语，我自己兼任校长职务。

依靠学费的收入我们雇了一个厨师，伙食是集体的，因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都是流浪在外，也没有固定职业，到我校吃饭的同志，不拿伙食费，亲如一家，非常天真坦率。我们这里没有“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我们有的是大公无私、以诚相待、谦虚谨慎、讲民主不固执己见，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团结多种不同类型思想的同志，看谁有困难互相帮助，疾病相扶持，欢迎别人超过自己，尊重人，同情人，我们大家相处一起，好象一所共产主义的学校，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救亡”团结战斗在一起。

在学校的楼底，专门招待各地来武汉的流亡青年，经过上级批准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学习，有的介绍到山西民革大学，与各